

# 動亂·闖關·成長

## 我的青少年時代

(上)

●薛光祖（校長、大學教授院長、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

### 封建社會農莊風情

公元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夏曆二月十日我出生於江蘇省漣水縣。這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的一年，孫中山手著的孫文學說在上海印行出版，北京各大學學生為山東問題舉行愛國大遊行，是為國內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一年。然而我的家鄉江蘇漣水，卻仍然停滯在半封建的農業社會狀態。

我們薛家的祖先原住蘇州，元末因避張士誠兵亂，由遠祖薛興七老人偕子四人到江蘇漣水定居。十四傳到我的曾祖父薛尚義老人，他在同治甲子年（一八六四年）中舉，同治乙丑年（一八六五年）高中三甲進士，欽點內閣中書，晉起居注主事轉戶部主事，後來升山西司轉授湖北道接篆。祖父薛閱亮老人為秀才出生，亦任職京畿，為兵馬副指揮。由於清末朝綱不振，曾祖父薛尚義老人遂告老，率子孫還鄉，從范氏手中購置金城莊良田數十頃。金城莊因附近的金城庵而得名。金城庵曾是金元朮的行營，遺留古蹟甚

多，「金城晚照」便是漣水縣十景之一。

我的父親薛秉明（字月亭）老人，讀完高等小學，因祖父逝世早，就回家主持家務，分得遺產五頃左右，將土地分給佃戶們耕種，與他們對分成收。平時地主家中有事，如蓋房子，婚喪喜慶，佃農都來義務幫工；佃農有什麼困難，父親當然也會給予援手。平時佃農到地主家，不能平起平坐，多站立或以足跟當凳，蹬在門旁，封建氣氛相當濃厚。

舊日的農村社會，保留有很多令人難以忘懷的回憶，如「趕集」、「剃莊頭」、「搶寡婦」等等。所謂趕集，因農村貿易量小，各地區或訂在每月的一、四、七日，或訂在二、五、八日，或訂在三、六、九日，選擇比較中心的地點，集會交易，把各人家中所生產的農產品及手工藝品拿來販售，再買一些日常用品回家過日子。集鎮上也有幾家店鋪，如油行、糧行、布店、雜貨店等。

鄉下人趕集時會把自己認為最漂亮的行頭穿出來亮相，常常將較好的鞋子夾在腋下

，赤腳走路，快到集鎮時，找個有水的地方先洗腳，穿上鞋子，再邁步走入市區。有時坐進茶館飲茶，吃盤瓜子，聊聊天，便是最大的享受了。平時只有挑著擔子的賣貨郎及背著大包袱的布販子來到村莊兜生意。賣貨郎的擔子裡有各色各樣的針線、紙剪的花樣子、胭脂花粉等，那是農村婦女們的最愛，布販子從山東來的賣棉布，從江西來的賣夏天穿的麻布，個個都是能說善道。

所謂「剃莊頭」，鄉下沒有理髮店，由剃頭師傅挑著擔子到各村莊去為人理髮，這種特製的擔子，一端有燒水的小爐子，俗話說「剃頭擔子一頭熱」，便是由此而來。剃頭師傅一到，要理髮的人便集中等候，剃完了就走，不需要付錢，直到端午、中秋和過年三節，剃頭師傅便推著車子到各村莊，按戶請給些麥子或雜糧，多少隨意，絕無爭議，大家都是高高興興，很有風度。除了剃頭師傅以外，像看風水的地理先生等也都是採用這種方式來為地方服務。

所謂「搶寡婦」，記得在我舅家的前

面小村莊裡，有位新寡的少婦，有一天來了十多個壯漢，將她搶劫呼嘯而去，在家人抗搶失敗後，也就認命了。由這「搶寡婦」的劣俗，可以了解在那個時代的農村社會裡，婦女是沒有人權、沒有地位的，甚至迷信寡婦是不祥之人。

## 天災肆虐人禍不絕

江蘇漣水位在淮河的下游，離入海口很近，千百年前屬於海埔新生地，土質並不肥沃，且由於黃河氾濫，河水改道淮河入海，每隔二、三年就有一次水患，廬舍蕩然。抗戰前陳果夫先生在江蘇省主席任內，加強督訓保安團隊，曾努力導淮工程，那時我們家鄉的壯丁，必須在農閒時趕去挖土堆堤，在風沙中渡過嚴寒的冬天，等到次年春天，大風又將堤上的沙土吹回河道裡，致導淮工程失敗，總工程師因此引咎自殺。除水災之外，有時還鬧旱災及蟲災。記得有一年秋天下午，突然天黑了下來，有如大雨將至，抬頭一看滿天蝗蟲遮住了陽光，剎那間，田野中的高粱與玉蜀黍全部被吃光，原來一片綠野，頓時變成枯黃大地。農民無法驅逐蝗蟲，只有在夜晚，燒起柴火，蝗蟲撲火光，如暴雨下降，嘩嘩作響，燒焦的蟲肉香味四溢，這種特殊景象，令人難忘。

因為水災、旱災、蟲災年年不斷，使得民不聊生。部分災民難免鋌而走險，或三五成群，打家劫舍。或百兒八十，結成股匪，

搶奪綁架，可比東北之「馬賊」。地方政府無力維持社會治安，保護善良百姓，地方人士只有自行組織「自衛隊」，聯合人槍，共禦匪患。有錢的人家有三道防匪工程，最外邊是用荆棘圍住，中層是用有刺的鉛絲網，內層是高大的圍牆，在圍牆的對角還做了兩個砲樓，可以用槍對圍牆的四周掃射。我在初中時，寒暑假回家，也要背槍巡夜，參加自衛隊的行列。

當時由於交通不便，貨不能暢其流，多餘的勞力，沒有出處，也就談不上副業了。鄉民在秋收以後，就閒散無事，勤儉者背著糞箕在田野裡撿拾糞便，以作肥料；或以棒頭（玉米）鬚搓繩子，點燃後掛在牆角當火種；懶散的人則蹬在牆角下脫下衣服曬太陽、抓蟲子。由這種情形可以看出我出生地的點滴，雖然如此，但漣水縣是我生命的發源地，我仍然深深的愛戀著它。

## 童年生涯峰迴路轉

我的童年就是在這樣動亂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中度過，養成我純樸耐勞的習性和無懼無畏的膽識。當亂兵來時我們全家就暫居鄉下，土匪猖獗時，我們就遷居縣城；住在鄉下舅家時，我曾讀過一年多的私塾。記得賈老師是一位典型的老學究，滿口黃牙，常用長指甲刮下的牙垢封信，講起書來口沫橫飛，口臭薰人，令人難以忍受，背書時，背對著老師以防偷看，背錯時常以戒尺

打手心；要大小便時必先向老師領取一面牌子，整個私塾只有一面牌子，第二人要大小便時，必須等第一位回來，才可以拿牌子出去，以免兩人同時在外玩耍，我就在這種情況下讀完了四書。十一歲那年，被送到縣城裡的「烈士小學」（為紀念縣中張、賈兩位革命先烈而創辦的學校）住校，就讀三年級。那時正是北伐成功，為破除迷信，農曆新年不放假，照常上課，我們幾個要好的朋友在除夕的晚上，溜出學校到同學家去聚餐。四年級時，我自恃成績不錯，要求跳到五年級不成，遂轉學到漣水縣最好的實驗小學，我在那裡一直名列前茅，頗得李校長景房及老師們的愛護。記得五年級時舉行全縣演講比賽，老師們選我代表學校參加，在這以前，我未曾在公共場所講過一次話，見到生人說話臉都會發紅、發燒；但是老師之命不敢違。老師打好了稿子，要我唸，要我背，放學後要留在學校，幾位老師指導我語調抑揚頓挫，姿態的高低進退及手勢與內容的配合等；喉頭練啞了，女老師就煮豆皮冰糖湯給我喝。經過一個多月的苦練，終於上台了，一眼看去漆黑一片，我就習慣性的把稿子從頭到尾講一遍，結果居然宣佈是全縣第一名，為學校爭得了榮譽。這次經驗，或許對我決定終生從事教育工作、憑口才傳道有關吧！

初、高中是在鄰縣的江蘇省立淮安中學肄業。淮安是一個比較富庶，文化水準較高的縣份，名勝古蹟甚多，如淮安侯張良的漂

母池、名書法家何紹基及羅振玉的遺墨到處可見，運河邊有名刹「湖心寺」，佈置典雅，建築雄偉，景色宜人，它曾一度掀起我的出世念頭。淮安中學是由省立九中改名，有個幽雅的讀書環境，我的學業與品格就是在這兒打的基礎。記得我常從論語、孟子中精選一兩節適合於我的警句，寫下來放在書案上作為座右銘。每晚於自習後就寢前在操場上一面散步，一面檢討當天言行，然後回到自修室寫日記。回想我一生立身處世，不離儒家傳統，或許莫基於此。

### 烽火起兮背井離鄉

民國二十六年，讀完高一的那個暑假，到鎮江郊區「三十六標」參加學生集中軍訓。集中訓練除愛國教育外重視生活磨練及戰鬥訓練，經常出操射擊，不時打野外與夜行軍，緊張而刺激。在訓練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北方局勢告緊，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了。一日數次號外，「三十六標」的氣氛突然緊張起來，當時的軍訓總隊長是國軍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將軍兼任，我們的大隊長就是赫赫有名堅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團長謝晉元烈士，那時他們一方面辦理訓練，一方面利用訓練之暇，率領部下到淞滬一帶勘察地形，積極備戰。當他們接獲作戰命令時，立即開赴前線，參加「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謝晉元大隊長，長得十分英俊，加上廣東人特有的高鼻深眼，目光炯炯，氣概非凡

，見之令人肅然起敬。他帶兵十分嚴謹，講話簡短有力，他高度的愛國熱忱，感動了所有受訓的學員，我這份為國盡瘁的傻勁，多少是受了他的影響。

「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日本人狂言要在三個月內征服中國。這時江蘇省大部分學校無法開學，我因痲疾向學校請假兩週，未及上學，學校就解散了。當時政府深知對日抗戰是一場長期戰爭，根據「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最高原則，認定教育是抗戰建國的基礎，不可廢，也不可停，於是在大後方將內遷的大學合併辦理，成立幾所聯合大學，也辦理十幾所國立中學，收容由淪陷區跋涉千里而來的中學生。江蘇省政府為了使省立中學學生絃歌不輟，分別在漣水及興化辦理江蘇省立第一及第二兩所臨時中學。我便就近到漣水石湖第一臨時中學受教。未幾淞滬會戰失利，日軍渡江，江蘇教育廳決定將志願到大後方的臨時中學學生，訂期在淮陰集合，送往後方繼續求學。我匆匆趕回家

的心情與勇氣了。

民國廿七年四月十六日在淮陰運河的碼頭，一艘小汽船拖了好幾隻大木船，載著百多位十二歲到十八、九歲的青少年，在悲壯的「流亡三部曲」愛國歌聲中，與師長、家長揮淚告別，大家不禁感嘆到「風蕭蕭兮淮水寒，學子一去今何日返！」此情此景，終生難忘。

### 苦中作樂奔向後方

由淮陰到隴海鐵路上的運河車站，船行就花了七、八個小時。下船時，正逢台兒莊大捷。遠方傳來的是轟轟的炮火聲、嗚嗚的警報聲以及隆隆的飛機聲；近處看到的是血肉模糊自前線受傷下來的將士，與後方增援上去的新兵。更看到由北平趕來戰地服務的男女大學生，一批又一批的到前線勞軍，參加救護工作，那幅緊張刺激的抗戰畫面，證明了中國是永久不會屈服的偉大國家。

在運河站改乘隴海鐵路鐵皮火車西行，車行到徐州車站又聽到警報聲，幾位將官匆匆的越過鐵軌，奔向車站，據說是蔣中正委員長親臨徐州督導作戰。

火車繼續西行到鄭州。當晚我們就借住在鄭州一所小學內，自行料理晚飯。我們三五好友，第一次嚐到躍過龍門的鯉魚滋味，店家提著一條活蹦蹦的鯉魚，當客人面摔死，然後拿回廚房做菜。次日改乘平漢路火車南下，同行者大部分的目的地都是經漢口赴

沙市到江蘇聯中就學。我們約有三十餘人經教育部分發到國立第一中學，就在許昌下車。許昌到國立一中所在地的豫西浙川縣，尚有三天的行程。我們這群沒家沒娘的孩子，背著沉重的行囊，第一天開始時尚可大步邁進，到了下午大家就像沒氣的皮球；第二天便像一群傷兵，個個腳破血流，寸步難行，第三天才漸漸習慣，精神也就好多了。記得第一天晚上在一間破廟裡，以麥稈鋪地，就地而臥，大家因長途疲累，睡得很甜，次晨起身，個個腿上滿布黑點，一揮動，才發現一群跳蚤，飛躍而去。第二天晚上，天色已黃昏，尚未到達目的地，雖見不遠處一片燈火，因為疲憊不堪，大家只好席地而臥，半小時後再重振疲乏之身，狼狽而行。當時雖是辛苦，如今回憶起來，倒覺得無限甜美。

我做事不怕難，不怕苦，到最困難時尚能撐持到底，或許與此經驗有關。三日艱苦的行程中，未曾放過苦中作樂的機會，我們暢遊了南陽的名勝古蹟。南陽以出產南陽玉聞名，通過大街小巷都可聽到吱吱磨玉的清脆聲音；更聞名的是諸葛廬，我們穿過了石人石馬的甬道，來到廬中，當年劉備三顧茅廬的鏡頭陳列在眼前。抗戰期中，我感覺到最需要的就是像孔明先生這樣智勇雙全的人才，和劉、關、張、趙的團隊精神。又見岳武穆書寫的前出師表石碑，諸葛的後裔卻以賣碑文為生，可惜我這個流亡窮學生未能購置作爲紀念。

步行第三天黃昏時刻，抵達國立第一中學所在地的浙川縣上集。街上傳出一陣軍號的聲音，據告是有人偷竊一隻玉蜀黍而被執行槍決，再進一步探詢才了解，豫南三縣——浙川、鎮平、內鄉——在土匪出身後來改邪歸正的別庭芳司令等領導下，實施地方自治，嚴刑峻法，已做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程度，是當時實施管、教、養、衛的模範地區。

### 爲逐良巢天涯行走

我們同行的人，除了少數師範生留在上集國立一中外校外，其餘的三十餘人都被學校編到國立一中西峽口分校。西峽口是別庭芳司令的老家，人口雖僅百餘戶，已有水力發電廠，家家有電燈可用，多餘的電力則用來製造農具；另有動物園、養蠶場、釀酒廠等。這個偏遠的小鎮，卻有現代化的雛型。

國立一中西峽口分校是以北方最負盛名之一的保定育德中學爲基礎而設置的，郝校長是同盟會同志，師資優良且富教育熱忱，圖書豐富，設備齊全。教育方式亦頗具戰時特色：每天清晨五時半穿著草鞋的訓導主任便敲響起床鐘，大家從炕上趕緊爬下來，拿著洗臉用具奔向操場，一面集合，一面唱歌，整隊後即跑步到郊外溪邊盥洗。之後，由學長領導作晨間活動，然後每人背一小袋沙土回校墊操場；晚餐後稍事休息再集合到不同的郊外跑步，通常來回約跑二十四華里，

所以個個都變成了飛毛腳。每日三餐，若是晴天就在操場用餐，下雨天就移到炕邊。八人一組，每餐輪流兩人到廚房取飯菜及送還用畢的碗盤；常常吃北方的窩窩頭及玉米稀飯。又因缺碘，因此豫南一帶得大脖子毛病的人很多，所以我們也時常吃海帶以補充碘。飯菜雖談不上好味道，但尚可飽腹。學生不但不需繳學費，伙食費等都是公家供給。學校的學習氣氛很濃厚，我除了正課外，差不多每天都到圖書館借閱一本小冊子來讀，日子過得很充實。唯一不能讓我們苟同的是，該校有部分老師思想左傾，學校似乎也在包庇他們，他們與陝北延安有聯絡，常常介紹學生到陝北的抗日大學。我們這批忠於政府的學生都感覺到此處非久留之地，時有去意，目標是湖北沙市的江蘇聯中。我們多次的向學校提出轉學要求，均未獲准，學校說：你們是教育部分發來的，未得教育部的同意，學校不能隨便讓你們走。最後我們以申請到四川投考軍官學校爲名提出申請，學校知道我們去意已堅，明知投考軍校並非事實，也不便強留，便舉行晚會熱烈的歡送我們。我們這群十三歲到十八、九歲的男女學生，又開始第二次的長程徒步行軍，雇了一輛牛車，代運較重的行李，其餘都由自己背著。穿上草鞋行走，經過內鄉、襄陽、樊城，到了沙洋，適逢沙洋洪水成災，家家戶戶屋破牆倒，我們只有在水退沒有好久的沙灘上就地而眠。女同學和年幼同學睡在中間，

較大的男同學睡在四週，再由幾位身高體壯的同學輪流守夜。月明星稀，寒風颯颯，在淒涼緊張的氣氛中，度過了難忘的一夜。

沙洋與沙市之間隔了一條九十里長的長湖，我們以「丘九」（抗戰時期稱士兵為丘八，學生為丘九）的姿態，向船家半強迫的租了一條船，夜渡長湖，聽說長湖的湖匪猖獗，時有劫財殺人之事。我們叫女同學睡到船底，男同學則睡在甲板上，並學了幾句江湖話，準備隨時應變。幸得上天保佑，這群流浪兒總算平安的抵達了彼岸——沙市。

### 流浪兒砲火中成長

江蘇省立宿遷玻璃職業學校因江西籍章校長繼南的關係，先將學校遷到沙市萬壽宮，待省立第一、二臨時中學學生由淮陰到達沙市參加該校後，奉江蘇省教育廳令改名為江蘇省立聯合中學，並加派武海樓、曹中權、郝述祖、彭大銓幾位先生及章繼南校長為校務委員。我們這批由國立一中奔回娘家的孩子抵達沙市後，聯中不便拒絕，准予轉學。初一到高二各班，唯有我們十四位高三學生，無適當班級可讀，隨即推派代表到漢口，拜訪當時江蘇教育廳長周佛海，承蒙撥專款四千元補助，新開一班，我們便成了江蘇聯中最高班的學生。沙市位於長江邊，街道整齊，學校面對著長江，氣勢壯麗，可惜在那兒沒有多久，武漢易手，沙市、宜昌告緊，江蘇聯中再度播遷到重慶南岸的野貓溪。後

來得到阜甯籍的江防司令之助，在南岸彈子石找到一幢樓房，就這樣分在兩處上課。在那段時間遇上了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五月日本對重慶的大轟炸，每晚要到山區逃警報，先是聽到嗒嗒的飛機聲，接著看到探照燈四射，再看到我機迎戰，實彈中夾著照明彈，構成紅綠火網的煙火；當敵機被擊中時，一團火球滾滾而下；人心振奋，掌聲四起；但是仍有部分敵機衝過防線，飛臨重慶市區上空，彈如雨下，頓時火光冲天照得長江與嘉陵江如同白晝，一片哭叫聲，慘不忍聞。我們這群流浪兒就在砲火中成長，在彈雨中接受教育。這批同學可算是抗戰期中江蘇青少年的精英，後來每個人都完成了高等教育，在學術上或事功上都有很好的成就。到台灣來的也有數十位之多，大家珍惜患難之交還時常聚會。

### 長路迢迢為赴入學

政府為便利學生投考大學，自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起舉辦全國大學統一入學考試。我參加了第二屆「統考」。高中畢業時，我對學教育、學醫、學法都有興趣，最後決定將教育放在最優先，因而被分發到設在湖南的國立師範學院教育系。師範生將來是要擔任教職，統招會特別要求通過口試，始可入學，當年口試我的委員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他那沙啞的喉音讓我印象深刻。

重慶到湖南有段遙遠的路程，需要一筆可觀的路費，而由家中帶出的二十塊袁大頭（銀元），早就用光了，幸虧天無絕人之路，就在這個時候，由報紙上知道政府新發表的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人在重慶，我就約了三位同學去上清寺韓府請他幫忙，韓主席看幾位乳臭未乾的孩子，居然有膽量來求助旅費，甚表關愛，同意補助，並勉以努力學習，學成後為桑梓服務。以後又看到報紙上基督教青年會補助「統考」錄取學生旅費的新聞，再去領一份。這樣旅費便差不多了，復得友人之助，搭乘設在湖南沅陵的第一兵工廠的便車，走過川黔公路的七十二彎，在遵義吃了廠長請的豐盛晚餐，那是我第一次嚐到舉世聞名的茅台酒，瓶開後滿室酒香，使人醺醺然。經貴陽轉湘黔公路，在玉屏買了一枝名簫，最後到達沅陵第一兵工廠。沅陵離國立師範學院所在地——安化縣藍田鎮尚有一段路程，我在沅陵住了好幾天，原本打算等候便車經邵陽去藍田，未能如願；因學校開學在即，不能久等，只好準備徒步前往，由友人黃君介紹一位黑道人物為挑夫。經激浦去安化，整整走了三天。當時湘西土匪猖獗，我所走的路線就是土匪經常出沒之地。我們有兩晚投宿在「雞鳴早看天」的小伙舖（湖南人稱小客棧為伙舖）內，第二天晚我在伙舖洗好腳，吃完晚飯後，來了一群不三不四的人物，在伙舖裡聚賭，時而向我問長問短，幸得挑夫的幫助，為我編了一套故事

，說我是落難的窮學生，路費早就用光，他家人同情我，要我送我到學校，騙過了歹徒，化險為夷。但是整夜我提心吊膽，不能成眠，次晨天還未亮，便趕緊起床上路，終於在開課前趕到學校。

### 良師益友收穫無窮

我所就讀的國立師範學院，是根據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教育部召開的全國第一次高等師範教育會議決議建立師範教育制度而創立。當時除了在中央大學、中山大學、西南聯大、西北聯大等校設置師範學院外，並請著名的教育家廖世承博士籌設一所獨立的師範學院，為新的師範學院制度從事實驗。

國立師範學院位於山明水秀湖南省安化縣的藍田鎮，籌辦之初，借用民初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李燮和私宅——李園，前有光明山，後有漣水，雖無宏偉的建築，但名儒大師雲集，學術氣氛鼎盛。湖南自曾國藩、左宗棠以後，文風素盛，著名學者專家在京滬平津一帶任教者衆，因戰爭影響，多願返湘任教，更因廖院長的名望與禮賢作風，濟濟多士，會集一校。國文系有國學大師錢基博、文字學專家馬宗霍、易學權威鍾鐘山、詩詞大家駱鴻凱等；教育系有教育哲學權威孟憲承、哲學大師黃子通、心理學史專家高覺敷、實驗心理學專家郭一岑、教育專家王士略（越）、社會教育專家董渭川、教育心理學者錢癩等；數學系有留德數學家李達及來台曾

任中央大學校長的李新民等。英語系有鼎鼎大名的錢鍾書、法文專家汪如封等，體育科有體育前輩金兆鈞、體育界權威江良規等；音樂科有聲樂專家唐學詠、鋼琴專家周崇淑等。

雖然錢鍾書（默存）在他的名著圍城一書中聲明，所寫故事為虛構，但由於我同班學長潘振球與他同由上海，經浙江、江西到湖南，因而隱約可見其對書中背景、主角及配角等構思的由來。錢基博與錢鍾書為父子，同時分別擔任國文系及英語系主任，傳為美談。

教務主任是汪德耀，他是法國國家博士，後任廈門大學校長，教我們生物學，深獲學生敬愛。汪德耀曾於民國八十二年底，九十一歲高齡到台灣訪問，國師校友曾聚餐歡迎。汪先生說錢鍾書先生曾面告其書中曾引用他的話說：「海外留學生內心多想做官」。訓導主任任誠（字孟閑），曾任著名的揚州中學前身江蘇第五師範學校的校長，是位實踐力行的教育家，言行中規中矩，始終與學生生活在一起，和我們一起排隊進餐廳，一起開動，公筷母匙，食時不語，碗筷自洗。任誠身材很矮，學生向他行禮，他總是將頭上的禮帽，用手向上高舉後點頭還禮，以提高他的形象。高覺敷是我的系主任，也是我的導師，每學期總要請其他的導師和學生們到他家中聚餐一次。使我受益最多的要算是黃子通教授，他曾任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因黃師母在貴州，隻身住在學校宿舍，每

週約我與潘振球到他宿舍兩個晚上，從學術研究到立身處事之道，無所不談，言必有物，獲益匪淺。大四時董渭川教我們社會教育。他特別重視成人教育，曾計畫以湖南邊區的靖縣為實驗縣，推行成人教育以實現地方自治的理想，要我們幾個學生草擬實驗計畫。從他那裡我學習到從社會、政治、經濟觀點看教育，也學到公文和計畫撰寫方法。大鳴大放初期被整肅的光明日報儲安平當時教我的政治學，他留學英國，剛回國任教，對英國民主政治及國會運作情形講解特別詳細，他的做官哲學是從科員一級一級向上爬，要爬到何時？做官捷徑是辦報，非部長不做。後來他就帶著我們同學雷伯齡等到上海辦觀察雜誌。

除了追隨老師學習外，同學間鼓勵切磋，獲益也不少。除了與同學們一起排隊搶圖書館座位外，每天晚餐後，三五知己或漫步田野，或在溪邊小坐，有時縱論天下大事，有時閒話生活趣聞。最使我難忘的是，與幾位同學在黃子通指導下，組織了哲學會，舉辦講演會、辯論會、座談會及論文發表會等活動。中心議題多為較抽象的哲學概念，如「必然與偶然」、「絕對與相對」、「時與空」、「學與思」……等等，看似空洞，但對離校後立身處事幫助很大。而那些當年死背的零星知識，雖使我的學業分數考得很高，但迄今仍然用得上的卻是很少，反而從哲學會所探索出來的原理原則，使我受益無窮。（未完待續）